

区域政策与区域经济

С. Б. Лавров

本文以联邦德国的材料分析为例。在联邦德国,社会—经济发展在空间上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正在不断加剧并将长期存在。本文试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某些因素所起的作用。这些因素主要有:新兴的科学密集型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国家和垄断集团在区域政策机制和目标上的差异;军事工业生产综合体的布局;各阶级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地位。这些问题有着鲜明的政治—地理学和地球生态学的意义。

区域政策一般是指为减少某国国土上各个区域间生活水平及发展水平上存在严重差异而制订的综合措施。也有几个国家共同制订的跨国的大区域政策。经济一体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就是一例。它力求使共同市场的各个部分相互协调,缩小贫困地区与整体水平的差距。在联邦德国,官方郑重申明的区域政策是“在全国各地创建平等的生存条件”,但实际上这个政策并未取得成效。

区分官方的区域政策与实际施行的国家—垄断组织的区域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前者不过于表示要修正地区间严重差异的官样文章,后者却是国家经济地域构成的主宰,决定了现存的生长极点,也决定哪些贫困地区仍将被弃如敝屣,而官方的区域政策是希望这些贫困地区的经济能够起飞。左右国家—垄断集团区域政策的主导力量是垄断集团及其党派,这些党派是代表大垄断集团利益的。因此,这个问题研究无疑带有政治地理的色彩。

每个联邦制的国家都有各自的行政等级划分。在联邦德国分为:联邦—州—社区三级。各州间冲突很明显,这些冲突反映了各州的党派构成。社会民主党控制的五个州与基督教民

理学家参加下开展了积极的研究。在战后,就这类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专著,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和官方出版物。出版了一系列定期出版物。研究的范围既涉及到首都及其整个地区,也谈到首都区的个别地区和城市。首都区和聚落发展计划的本身就是对其社会—经济情况作了详细描述。英国在准备制订发展东南部地区发展计划过程中,公布了五卷计的材料(60年代)。对社会—地理问题特别关注,其中包括对处境不佳居民阶层的安置问题。

如果某一经济的或社会问题出现尖锐化,一般要建立专门的多学科委员会进行有效的研究并提出报告(报告中一般包括详细的统计附件和地图)。这类暂时性联合组织的效果如何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然而从实用角度出发这样作可能是有利的。

1974年以后席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系统,其中包括地区政策领域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国家收入减少和财力不足、失业率普遍大量增加、大伦敦和伊耳德法兰西内部地区危机条件下,首都区和聚落的疏散问题并不十分突出。为了解决地区发展比例失调问题,就必须降低首都区负责实施科学—管理功能的相应部门的集中程度。在法国以分散管理取代集中控制,较多的权利交给地区政权机构。这是在国家社会—经济作用增长的条件下实施的。在英国则是尽量减少地区政策的作用,地区政权机构所有的权利(东南区和大伦敦)或者转让给不考虑地方问题的中央机构或者转让给没有解决地区问题财力和可能的地方权利机构。

跃辉摘译自《Изв.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геогр. 》, 1986, No 4

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及自由民主党控制的五个州分庭抗礼。只有在社区这个最低行政单位上,居民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才能得到较为实际的反映。许多公民指出他们反对上面作出的政治、经济及生态环境方面的决策。

始于五十年代初实施的官方区域政策的结局,是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的背离,使原本少数的几个贫困地方扩展成一片。产生了类似全球问题特点的“南北关系”形式,不同的是,在这里北方成了国家头疼的地域,南方却是相对富庶区。北方的失业率比中部地区高20%,南方比中部低20%。1986年5月,北方的失业率创下了新的纪录:不来梅15.1%;汉堡12.9%,高于最大的中部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10.7%)。

北方的一些州和村社的债务也较高(如不来梅比南方高5倍!),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大部分人得到的社会救济金比南方的巴登-符腾堡高一倍。由于黑色冶金业的危机,西欧的北部地区被人们称为“生锈地带”,而把联邦德国南部称为与美国相似的“阳光地带”。

由220家电子公司和国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三万名学生)组成的慕尼黑科技工业园,因与美国著名“硅谷”相似往往被人们称为联邦德国的“伊扎尔硅谷”。

现代科技领域中最大的垄断集团中心集中在南方是南方经济起飞的根本原因。这些垄断集团是科技革命时代的领导者。它们主要有,化学巨型企业“赫斯特化工股份公司”,巴地斯苯胺苏打公司、西门子电子公司、德国通用电器公司以及汽车制造、军工生产方面的垄断集团。

在上述的区域性康采恩中(它们实际上都是跨国公司),“区域性”这个词只是指他们在联邦德国国土上的生产基地的集中。1981年占据首要地位的有:西门子电子公司,第一位;戴姆勒—奔驰公司,第三位;巴地斯苯胺苏打公司,第五位;赫斯特化学公司,第六位。即南方垄断集团在前六名中占了四个席位。1985年他们的地位由于新的兼并更加稳固了。南方没有危机部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危机部门主要是采矿业及那些过时的,在科技革命时代落伍了的老垄断集团(不包括萨尔区),以上的原因都是客观存在的。

在新形势下,一些垄断集团做出了反应。北方唯一的一家生产电子计算机的厂家——尼克斯多尔福公司想把一部分生产迁到慕尼黑,而把有优势的工厂福尔斯瓦格斯韦克留在北方(沃利夫斯堡)专门为南方生产昂贵的机器。

在类似的区域重新调整中政治上层建筑起了很大作用。军事订货,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的投资,原子能国家基金建立等等,分配到哪个州,上层建筑此时将起决定性作用。1969至1982的13年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下野,社会民主党执政。为什么这期间南方继续受益呢?显而易见,首先,经济政策的实施有惯性,其次,南方的一些州已经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整个期间,对南方经济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州巴伐利亚和巴登-符腾堡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一直掌权)。

六十年代,由于联邦德国军事工业联合企业复兴,约50%的军事订货生产放在巴伐利亚州。1978年该州从军工部得到的资金比巴登-符腾堡或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多1.5倍。由于政府多年的投资,该州的福里克区已成为南方最大的军火生产中心,许多大公司在此联合生产。如生产豹式坦克的克拉乌斯马费依公司,戴姆勒—奔驰公司,乌尼奥思涡轮发动机公司等等,它们使福里克又恢复到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火生产规模。从六十年代起坦克生产计划“最大部分的订货”落到了南方,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八十年代。

西德军工联合企业分布在南方的原因既可理解为一种传统因素的作用(密西尔施密特和多尔耶的许多厂家,都设有靶厂和试验中心),也可以认为是基督教社会联盟频繁活动的结果。巴伐利亚州有着特殊的政治环境:宗教以天主教为主,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大量

的苏台德区的移民，在六十一七十年代基督教社会联盟几乎拥有一切权力，因此促成了巴伐利亚变成了《联邦德国的加利福尼亚》。

军火生产的布局可以吸引新的高科技部门和与军火生产相关的科学研究组织。目前传统的布局思想“资源条件→相应产业布局”已不是绝对的了。相反的关系出现了：现代化的军火生产并不趋向金属产地，而是趋向于布局在高技术中心地区，如趋向现代技术的精髓电子中心。所以设在南方的生产基地和科研中心的西门子电子公司和德国通用电器公司像磁石一样吸来了不少部门。但若没有政策力量的配合也是办不到的。联邦德国科技部用于科研的投资在地区分配上实行明显的倾斜政策，1980年南方人均占有该项资金34.5马克，北方仅为27.5马克。北方的政治家们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南方政治家坚持认为，平均使用该投资，对全国整体的经济利益是有害的。

使南方更为有利的是，政府将准备取消对巨型康采恩合并的限制。关于这一点，上文谈到的巴伐利亚军工生产综合体，正在向形成超级康采恩的方向发展，著名的杂志《镜铁报》也承认有此趋势（1985年，第43号）。

1985年联邦德国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司兼并：曾经吞并了“乌尼奥恩涡轮发动机公司”（该公司为飞机和坦克生产发动机）和著名宇航技术中心“多尔耶”公司的戴姆勒—奔驰公司终于吃掉了德国通用电器公司，组成了有295000人的、占联邦德国垄断集团第一位的超级康采恩（584亿马克的固定资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民用的康采恩基地诞生了一个最大的武器生产者。各个分公司都要或多或少地为武器系统提供一部分零件。在多尔耶，军工生产占全部生产的51%，在乌尼奥恩公司占52%，在德国通用电器公司占20%。参加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正为它们开辟更广的生财之路。

在巴伐利亚州有可能以“密西尔施密特—别里柯夫—伯留姆”公司（该公司现在军工生产垄断集团中排名第二）为中心，联合一些公司形成一个巨型康采恩。首先吞并的将是“克拉乌斯—玛费依”公司（它生产的是豹式坦克，军火生产在该公司占84%，创了联邦德国的纪录）。

“北方的政治家和经理们不安地注视着，一个新的工业枢纽正在南部形成”。——《镜铁》杂志写到。

国家和垄断集团的区域政策是在地生态形势尖锐化条件下制订和实施的，以致引起了大规模的生态运动，使绿党得以兴起，在联邦参议院中的席位增多。但绿党对联邦决策的影响还很小，况且该党内部在参加某项决策中，如何提高自身地位问题上尚存在分歧。

在一些大型的原子能设施周围爆发过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比如反对在瓦克斯多尔耶建设核装置的计划的示威活动（北巴伐利亚）。结果，施特拉乌斯州长声明，巴伐利亚同意在瓦克斯多尔耶建核装置，但拒绝提供存放核废料的场地。

但这些并不能影响联邦政府利用核能的构想。1000—1500亿马克将投入核能利用，北方各州50%以上的能源要靠核电（汉堡70%；不来梅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略低些），但该计划投资在地区间如何分配，将主要由哪个党在波恩执政来决定。另外与州的党派政治力量分配有关。

生态运动不断扩大激怒了垄断集团，当科尔政府在里森州开始积极地严厉推行反污染条例时，垄断集团以“减少投资”相威胁。德国强大工业联盟会的领导人兰柯曼，为维护莱茵河主要污染者之一赫斯特公司的利益，毫不掩饰地暗示了这一点。

在各州重新分配资金比例，直接影响各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富裕地区资金流向贫困地区”，这曾经是简单而正确的原则，但在七十一八十年代的实践中，资金却流向了主要垄断

日本制造业的区位动态与空间结构*

——日本工业主导部门调整过程评述

Koji Matsushashi, Koichi Togashi

一、引言 1973年的首次石油危机冲击了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的条件和结构,使日本曾处于动荡、迟缓的经济增长时期。这一过程在持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使工业结构发生变化的特征,并且日本制造业的区位动态和空间结构出现了新的趋势,但这种趋势与1973年前

集团生产基地地区。到目前为止,富裕地区只剩下三个:巴登-符滕堡(1985年上交政府15.82亿马克)、黑森(上交5.28亿马克)和汉堡(上交3.38亿马克)。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八十年代开始从富裕地区的行列里正式跌入“没有生气的州”(既不创收也不用补助)。但如果不是对比平衡后各州交的绝对数值,而是每个居民平均多纳税的最多数,就可以看出,纳税最多的是汉堡,1985年人均212马克。该州自1950年以来共交纳120亿马克,而从1970年以来(虽然那时港口城市危机征兆已很明显)就纳税68亿马克。但是,正如克·福恩·多那尼市长指出的,“如果计算汉堡自1970年纳税68亿马克的同时,巴伐利亚从‘地区平衡基金’中得到了38亿马克,那么这个制度是十分荒谬的。”汉堡那时,甚至现在,也绝对不是万事如意的,汉堡1986年失业率为12.9%,而南巴伐利亚只有5.7%。从下野的社会民主党控制的汉堡来的资金,源源不断地被抽向军火生产基地巴伐利亚州。由基督教民主联盟控制的下萨克森州,一直是这笔资金的最大受益者。1985年仅从其他州它就得到约10亿马克,加上从联邦政府得到的5亿多马克,还有一笔很大数目用来支持其发展石油工业的费用。

这种“平衡”方式继续下去的后果将是什么呢?一家周刊指出,“这种各州之间协同生活和行动可能使联邦德国受到这种情况的威胁,区域间生活水平明显拉大,一些富裕地区象孤岛一样生存在周围贫困地区的海洋中”。这的确在发生着。问题尖锐地显示出来,不仅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专业性文献中展开广泛讨论。1986年卡尔斯路爱联邦法院考虑修改“平衡机制”。但西德报刊对此事能否实现颇为怀疑。联邦法院打算1988年以前修改“平衡体系”,这可能是《龙生跳蚤》大失所望。

各种政治势力的自由竞争和社会—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的社会后果在加剧。问题主要出现在新的贫困地区,尤其是北方。1982年5个北方州的犯罪率最高。一家社会学学院的报告指出,莱茵河以北的生活质量比南方低得多。汉堡占第三位(续慕尼黑和斯图加特之后),人们都清楚生活质量对吸引工业的作用。

巴茨预测研究所预测南方新产业部门比重将下降,第三产业将上升;黑森和巴伐利亚州到2000年将成为经济最有成就的州。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地位将恶化。大概是激化了地区间经济不平衡的结果。甚至在下萨克森和斯列斯末克—高尔士津等基督教社会联盟嫡派地区也可能下降。1987年波恩大选政治形势可能变化,但不可能消除这已形成的严重的比例失调,它将长期存在。

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程度与联邦德国类似,尤其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心的西欧。

张玉斌译自《Изв.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1987. 1. 地情校

* 由于篇幅所限,对原文略加变动。